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十五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唐代山西边塞诗人

田晓宇

段进莉

著



唐代山西边塞诗人尤以王昌龄、王之涣、王翰为代表，“三王”经历虽然不同，但在盛唐诗坛上都占一席之地，他们以短小诗体形式来表现边塞风情，是边塞诗创作的早期人物，“三王”为边塞诗的发扬壮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王灵善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5辑)

唐代山西边塞诗人

田晓宇 段进莉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375 字数:300千字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978-7-900434-78-4
G·108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杨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钟声扬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士星
郭双威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唐诗中的边塞诗 (2)

二、山西的边塞风情与边塞诗人

... (9)

(一)仕途多舛命运厄，诗家夫子

王昌龄 (11)

(二)三贤士旗亭画壁，王之涣一

曲夺魁 (24)

(三)恃才傲物唯王翰，豪荡不羁

真游侠 (32)

结 语 (37)

引 子

中国是诗的国度，从西周到今天，绵延三千多年从未中断。作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诗不仅使其他文学体裁具有明显诗化的倾向，比如赋、骈文、词、曲等，就连一些艺术种类也受到很大影响，苏轼在《文与可墨竹屏风赞》中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他认为书法和绘画都是“诗之余”，由此可见诗的影响力有多大。而唐朝则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全盛时期。

清康熙年间编撰了一本《全唐诗》，里面总共收录48 900多首诗，作者2 200多位。在这2 200多位作者中，不仅有帝王、卿相，还有商贾、布衣，就连僧侣、道士、妇孺都参与到诗的创作中来，遍及社会各阶层。他们创作的诗通过传抄、吟唱、题壁等方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直到今天，其中一些脍炙人口的佳句还不绝于我们之口。

对于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后人推崇备至，认为不论是诗歌体裁的完善程度，还是诗歌技巧的娴熟程度，不论是揭示生活的深度，还是反映现实的广度，都已经达到不可逾越的地步。有人称唐诗，有人称诗唐，把唐朝与诗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可分隔体。所以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论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时，就毫不犹豫地將诗作为唐一代的代表性文体与楚国的骚、汉代的赋、六代的骈语、宋代的词、元代的曲，并列在一起，并且说这些文体在它们那个

时代取得的成就是“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一、唐诗中的边塞诗

唐朝有将近300年的历史,在这300年里诗歌取得前所未有的繁盛,其中既有社会方面的外因,也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因。首先,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长期混乱的分裂状态,唐取代隋后,重新建立了大一统王朝,国家空前强盛,对外贸易发达,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在相当长时间内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一番太平盛世的景象。强大的国力和繁荣的社会,不仅为诗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物质条件,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于诗人们的创作心态,激发起他们的创作热情。尤其唐王朝政治开明,儒释道三教并存,思想自由。诗人们可以博览百家,敢于直抒己见,放言无忌,自由地选择题材,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诗歌的艺术价值。其次,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四言、五言、七言、杂言、骚体、乐府、古诗、新体诗等各种诗歌的形式到了唐代已经趋于完备,这给诗人们在体裁的选择上也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所以,尽管在唐以前有《诗经》、《离骚》、《古诗十九首》等不逊于唐诗的不朽诗篇,在唐之后有数十万之巨的清诗,数量上远超过唐诗,但还是独独让唐代享有诗名。唐诗不仅在数量上可观,质量上卓然超群,关键是整体水平之高,是前朝后代所无法比拟的。宋代诗评家严羽认为唐诗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跟唐代实行“以诗取仕”的科举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他在《沧浪诗话》中说：“或问唐诗何以盛我朝？唐以诗取仕，故专门之学，我朝所不及也。”严羽说的有一定道理，在中国古代，文人求学的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通过入仕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就是“学而优则仕”的道理。唐代的“以诗取仕”制度便如一剂催化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条件都已成熟的前提下，使得诗歌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盛起来。

那么，“以诗取仕”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选官制度？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选官制度，比如，春秋以前是“世卿世禄”制度，汉朝是“察举”制度，魏晋时是“九品中正”制度等。唐代没有沿用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制，而是继承了隋代的科举制来选拔人才。九品中正制是根据家世、道德、才能举荐人才，这三者中门第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社会上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而科举制则是通过考试来选用人才，这就打破了门阀制度，有利于人才的选拔。唐代的科举设科繁多，主要科目是明经科和进士科。明经科考查的是儒家经典，进士科则考帖经、杂文和策试三门，其中杂文最重要，就是指应试者的诗赋创作能力。诗赋考查又分为省试诗和行卷诗。“省试诗”考查士子的作诗技巧，绝大多数用赋体，不用比兴，在内容和声韵格律上有很多束缚。而“行卷诗”则较为自由，它是指士子在考试前将自己所作的诗文投献给当时的卿相名流，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以求在科考中得到主考官的重视，所以作好行卷诗就成了士子步入仕途的捷径。

自从实行科举考试以来，社会上出现了“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专心于科举考试的风潮，而进士科受重视的程度要远远高于明经科，许多官员以进士科出身为荣，所以每个人在诗歌创作上都是倾尽全力，杜甫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李贺在《南园十三首》中则称“寻章摘句老雕虫”，卢延让《苦吟》中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而贾岛《题诗后》中则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阮阅在《诗话总龟》前集引李颀《古今诗话》说：“唐人为诗，常积思数十年，然后各自名家。杜少陵云：‘更觉良工用心苦。’”可见唐朝人作诗普遍都是苦于用心，勤于雕琢，所以唐诗能够繁盛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于这 300 年唐诗的分期，后世大多遵循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中划分的初、盛、中、晚四个阶段，但在具体时间段上的划分又有所不同，现在公认的是：从高祖武德元年（618 年）到玄宗先天元年（712 年），为初唐；玄宗开元元年（713 年）到代宗永泰元年（765 年），为盛唐；代宗大历元年（766 年）到文宗太和元年（835 年），为中唐；文宗开成元年（836 年）到昭宣宗天祐元年（907 年），为晚唐。其中盛唐，不仅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唐诗的鼎盛时期，更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经过唐初 100 年休养生息的政策，到了唐玄宗时代，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出现全面兴盛局面，国力空前强盛，四海咸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元盛世”。文学上的盛唐包括唐玄宗、唐肃宗两朝，约五十年的时

间。在这期间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大诗人，如群星丽天，不仅有像王昌龄、王维、孟浩然、王之涣、岑参、高适、李颀、崔颢等让人耳熟能详的名字，更有如李白、杜甫这样千古留名的伟大诗人，精美诗篇更是数不胜数。这些诗人们经历各异，风格不同，但都拥有宏大的理想与抱负，希望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在诗歌里就表现出慷慨激昂和锐意进取的时代气息。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总结盛唐诗歌的风格时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所以“雄壮、浑厚”便成为盛唐诗歌的主要特征，后世称之为“盛唐气象”。这是一幅让后人企羡不已的壮观景致，诗人们胸襟开阔，意气昂扬，以自己热情洋溢和豪迈奔放的诗句表现盛唐时代的种种面貌。

在盛唐诗歌的众多题材中，最能表现“盛唐气象”的就是边塞诗。边塞诗以描写边陲地区的奇伟风光、紧张的战事和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为主要内容，风格雄豪，诗境壮阔，正是唐王朝强大综合国力的有力体现。

其实早在汉魏时就已经出现了以边塞为题材的诗歌，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曹丕的《燕歌行》、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等，它与王朝疆域的稳固与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唐代建国之初，虽然结束了国内动荡、分裂的局面，但国家的边境却不安稳，一直受到北部东突厥的骚扰。东突厥屡屡侵犯太原边地，甚至还一举打到京城长安，唐高祖都考虑过迁都南方。所幸在随后的战事中一举消灭了东突厥，确保了国家的安全，但边境战事并没有中断过，所以唐王朝格外重视边功。

在唐朝，国民有一种从戎报国的普遍心理。他们具有强烈的汉朝人的情节，因为他们所处的境况与汉朝有许多相似之处：大一统王朝、国力强盛、还有不断的边境纷争，汉代连续击破匈奴的伟大功绩让他们神往，汉代在他们心目中赫然成为一种楷模，所以被不断讴歌，如高适倚靠着剑，面对大漠风尘，想起了当年卫青、霍去病在边塞立功的英雄事迹（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王昌龄则祈愿边关如果有李广这样的将军立马阵前，一定不会让胡虏的铁蹄踏过阴山（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维看到君王把宝剑、角弓和骏马赏赐给出师的将军，说这就像当年汉王朝赏赐立过无数战功的嫖姚校尉霍去病（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所有人都在共同描绘了一幅“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图景。

开元中期以后，随着唐朝国力的不断增强，边疆的战事也逐渐变得不再惨烈，但注重边功却一刻也没放松。唐玄宗有“吞并四夷”的志向，这以后的边境战争不再是防御性的，而是属于开边性质。由于朝廷大力提拔立有边功的人士，一些从军外幕的人可以跃级升迁，所以朝廷内外形成以从戎征战为荣的风气，岑参在《送张献心充副使归河西杂句》中这样形容那些立功进级的人：“未年三十已高位，腰间金印色赭然。前日承恩白虎殿，归来见者谁不羡。”在此风气影响下，更加坚定了人们从戎报国的决心。文人面对此情此景，有两种心态，一方面，国力的强盛让他们欢欣鼓舞，他们乐于寻找机会入幕从军，价值取向开始趋向“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并且有重武轻文的倾向，如“大笑向

文士，一经何足穷”；而另一方面，这也给许多在科场上失意的文人提供了入仕的新途径，正所谓“天子不召见，挥鞭去从戎”，从军入幕建立边功在他们眼中成为比科举更为便捷的入仕之路。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即使是那些没有亲历边塞的文人，也会被神奇的塞外风光、激烈的边塞战事所牵动，竟有一种魂牵梦绕的感觉。

边塞诗在题材和内容上，也是多种多样，其中有抒发将士建立军功的壮志，也有咏叹英勇报国的气概，高适在《送李侍御赴安西》中写到：“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崔颢在《赠王威古》中写到：“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就是对这种豪情壮志的直接抒写。

边塞诗自然少不了激烈战争场面的描写，高适的《燕歌行》最为出色，他把战争场面写得惊心动魄，让人身临其境：“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这种氛围、这种气势，即便跟《三国演义》里的“官渡”“赤壁”等大型战役相比，也不为逊色。而面对这些激烈战事，诗人们又表现出了必胜的信念，誓言“不破楼兰终不还”，或者是表明心迹“愿将腰下剑，直斩小楼兰”，等等。此外，边塞诗中还有描写雄武壮观的军容气势，祖咏在《望蓟门》中便看到“燕台一望客心惊，箫鼓喧喧汉将营。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这样的军营是何等威武何等壮观。

除了直接描写军容和战事外，边塞诗也把视角转移到粗犷豪放的边塞情调与壮丽新奇的异域风光上。如王维奉

旨出使到了塞上，看到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辽阔图画。崔颢到了边塞，也体会到了与内地不同的景致——“燕郊芳岁晚，残雪冻边城。四月青草合，辽阳春水生。”在这方面最为显著的代表是岑参，他有长期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所以刻画出的边塞生活图景更为生动——“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此外，边塞诗中有不少是战士的思乡之情与对生离死别的幽怨之情，王昌龄在《出塞》中这样写到：“秦时明月汉时关，古来征战几人回。”直接点明战争的残酷性——只见人出、不见人回，这是多么悲壮的场景？短短七个字便将生离死别跃于纸上。而那些长期滞留塞外的人一旦遇见将要入京的使者，思乡之情更是无法掩饰，岑参便这样说道：“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由此可见，唐人对这种幽怨并不避讳，他们直抒胸臆，显得更为真诚，更为感人。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幽怨中却看不出半点悲观的气息，反而是豪情满怀，这是基于对国家的极度自信，透露出的也正是盛唐时代的精神面貌。反观宋代，便形成鲜明对比。宋朝对边境战事一直处于惶恐不安之中，即便是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的大词人辛弃疾，尽管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概，表现出的也只能是只手擎天、壮志难酬的无奈。

盛唐边塞题材创作非常繁荣，其意象宏阔，基调昂扬，气势流畅，无论是平中见奇，还是悲中见壮，始终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这正是那个时代的集中体现。参与到边塞诗

创作中的诗人很多,其代表人物是高适和岑参,所以边塞诗派也被称为“高岑诗派”。

二、山西的边塞风情与边塞诗人

山西在春秋时期属晋国地,故简称晋。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分晋国,所以山西又被称为“三晋”。山西在中国古代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其地理位置非常独特,东有太行,西有黄河,关山险固,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由于南接中原,北连胡夷,又成了连接中原和北方各民族的咽喉要塞。

早在夏、周时期,山西便是夷夏混杂的区域。自春秋以来,这种状况就更加明显,山西北部除了有北狄居住,还有林胡、楼烦等部落。战国时,赵武灵王曾在这里“胡服骑射”,向北开拓疆土,并且顺着阴山修筑长城,与匈奴、楼烦、林胡为界。

秦以后,匈奴成为北方强国,一直骚扰边境。汉朝虽然执行了“和亲”政策,但在战备上却没有放松,曾大量从关中移民充实塞外,并在塞外筑城,设郡县,防御匈奴南犯,山西的地理位置显得越发重要。那些建筑来防边的长城,当时称为边塞,简称塞,或称障塞,同时还沿边塞修筑了障、城、亭、燧等军事设施,成为驻军防戍的主要建筑物。

在应对中国北方部落入侵的问题上,历朝历代一直都

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汉、唐两朝是最为有成效的,也只是达到相对稳定,这个问题直到清朝中期才得到彻底解决,可以说北部边防问题基本上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史。

由于李唐肇兴于太原,太原被认为是龙兴之地,所以山西受到唐王朝格外关照。唐朝时期,山西涌现了大量人才,并大多投入到唐王朝的建设中去,为唐王朝的繁荣立下汗马功劳,应该说唐朝是山西最为辉煌的时代。而此时的北方部落几经变更,成了东突厥。山西北部雁门一带成了边防重地,是抵御东突厥的军事要塞。

公元723年,唐玄宗巡幸河东,随后又北上太原,并定太原为北都。皇家的眷顾引来许多人的追随,山西一时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如同受到召唤一般,许多诗人便相随涌入山西,王昌龄便是个例子,他从长安起程赶到山西,专门作了《驾幸河东》,记录下当时唐玄宗到山西时的盛况:“晋水千庐合,汾桥万国从。开唐天业盛,入沛圣恩浓。下辇回三象,题碑任六龙。睿明悬日月,千岁此时逢。”从此以后,文人们除了出塞到安西和参预军幕外,就是到幽蓟一带旅行。

李白分别于735年和754年两次来到山西。第一次是应元演邀请到太原游览,许多年后他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还清楚地记得“晋祠流水碧如玉”。第二次则是从幽州进入山西,来到北岳恒山,后来又去了雁门关,在此期间作过《战城南》、《秋夕旅怀》、《塞下曲》、《拟古十二首》、《妾薄命》等诗。

以“昔人已乘黄鹤去”闻名的崔颢也到过山西。他早年诗风浮艳,可是到过边塞之后,晚年的诗风发生变化,成为

一位有名的边塞诗人，诗风也转变成苍凉凌峻。山西代县雁门一带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边塞生活素材，《雁门胡人歌》就是那时创作的，这首诗写边地少数民族好勇尚武、粗犷豪迈的面貌，非常生动。

大诗人杜甫也是先后于730年和744年两次到过山西，塞北的景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诗中写道：“下马古战场，四顾但茫然，风悲浮云去，黄叶堕我前。朽骨穴蝼蚁，又为蔓草缠。”历史的纵深感与人生的际遇在这里进行交织，表现出一派寥落、悲壮的气氛。

边塞诗的代表人物岑参幼年就跟随父亲在阳城和晋州（今临汾）住过八九年，幼年情结对任何作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相信岑参也不例外。746年，已是壮年的岑参再次游览山西，这次专程到达塞北，为他日后的边塞诗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山西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吸引了大批诗人频频眷顾，为边塞诗的创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孕育了一批自己的边塞诗人，其中以“三王”——王昌龄、王之涣、王翰最为有名。

（一）仕途多舛命运厄，诗家夫子王昌龄

唐天宝年间，某一天清晨润州（今镇江）芙蓉楼上，主人与友人依依惜别。经过一夜的秋雨，气氛萧瑟，徒给送别增添了惆怅。主人望着迷蒙烟雾笼罩着的吴地江天，心中孤寂之情油然而生，挥笔而就：“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位主人就是盛名一时的大诗人王昌龄，即将登舟北上的则是他的朋友

辛渐。因为辛渐要回洛阳，马上就跟亲朋好友相聚，而留在此处的王昌龄却只能像远处的楚山一样，孤零零地伫立在江畔空望着流水逝去。于是王昌龄叮咛辛渐说：“你到洛阳之后，如果有亲朋好友问到我的近况，就说我的心已不受尘俗的污染，就像玉壶里的冰一样清莹洁净。”“冰心”二字见于《宋书》卷九十二“冰心与贪流争激，霜情与晚节弥茂。”这是刘宋时代一位清平无私、为人民所爱戴的良吏陆徽说过的话，王昌龄取用“冰心”二字，表示自己与这位廉洁恪勤、奉公竭诚、克己无倦的陆徽有相同的志向。“玉壶”典出南朝宋诗人鲍照的《白头吟》“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用来比喻高洁清白的品格。

客居异地，托人给亲友带口信，本来应该像高适那样“凭君传语报平安”，可是王昌龄却在表明自己坚持洁白自守的志趣。初看好像有些悖于常理，但是从他的角度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此时的王昌龄刚从人生的第一次贬谪中解脱出来，他想用“一片冰心”表明自己高洁清白的品格并不会因为仕途不遇而变质。

望着渐渐隐没在烟雨中的友人，王昌龄站在芙蓉楼上，任凭风雨吹打，兀自不动，眼前回放着的是自己前半生的一幕幕画面。

开元十五年(727年)对于王昌龄来说，是个喜庆的年份，因为这一年他进士及第。唐朝的科举考试主要是明经和进士，明经比较容易考中，但要考中进士却非常困难，士人一旦及第就会名闻天下，所以进士及第又被比喻成“登龙门”，就像鲤鱼跃过龙门化身变成一条龙一样，对于一个

人来说,简直是翻天覆地、脱胎换骨的变化。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思是说30岁考取明经科已经很老了,50岁考取进士科还算年轻。像孟郊46岁考中进士后,便在《登科后》中兴奋地说:“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王昌龄考中进士才30多岁,应该是一件更为得意的

事情。可是按照唐朝选官制度,科举及第后还须经吏部的考试,合格者才会被授予官职。吏部考核主要从体貌、言词、楷法和文理等四方面进行,如果这四方面都通过了,就要考查它的德行,但德行的好坏是随考核官的个人好恶而定,所以如何讨好考核官也是士子们中举后考虑的一件大事。王昌龄考中进士后,得到一个秘书省校书郎的职务,这是一个听起来很高雅、实际上却没什么实权的正九品上小官,可见王昌龄虽精通诗赋,却疏于人事公关,所以在吏选中并没有得到自己理想中所要得到的职位。这大概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秉性,人际方面的不足将成为一生中的拦路虎。作了校书郎后,王昌龄曾作了一首《风凉原上作》,诗这样写道:“海内方晏然,庙堂有奇策。时贞守全运,罢去游说客。予忝兰台人,幽寻免貽责。”意思是说,像我这样抱有奇策的人既然得不到重用,那就只好四处转转,看看风景,免得因为多说话受到谴责。尽管如此,王昌龄并不气馁,7年后又考中博学宏辞科,这才有机会调迁为汜水尉。

汜水尉是一个正九品下比秘书省校书郎还低的官,但虽然官阶不高,却是实职,干好了很容易得到升迁。并且由